

內藤湖南筆下的文廷式印象及其評價

張 凌 雲

Naito Konan, Wen Tingshi, impressions, evaluation

ZHANG Lingyun

Naito Konan'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has established hi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n knowing China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valuating Chinese reality. And his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reality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s understanding of whole China. Especially, since Naito's several times of arrivals and returns to China in 1899, he got acquaintances with many Chinese scholars and learned men. In Naito's works, thes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present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Wen Tingshi, the former Imperial Academy academician reader-in-waiting, was acquaintance with Naito in Shanghai in 1899 and then met with him several times in Tokyo in 1900. Naito and Mr. Wen not only exchanged opinions upon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endowed their works to each other, but communicated on literature and shared the literary document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views of Naito, Wen Tingshi "is known for superior literary talent," and is "one of the best scholars in the South China area". Besides, he was also a "unprecedented genius" through "being proficient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mastering wide and abundant knowledge". Accordingly, Naito regarded him as a model of Chinese people remarked as "preferences to reading", and the scholar-bureaucrat "without realizing ambitions". This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mpressions on Wen Tingshi formed in Naito's works and the evaluation of Wen Tingshi by Naito.

キーワード：內藤湖南 (Naito Konan)、文廷式 (Wen Tingshi)、印象 (impressions)、
評價 (evaluation)

引言

《文廷式集》(汪叔子編, 1993年)中錄有若干首文廷式與日本文人、學者的唱和之詩, 其中一首如下所示:

七國三邊正糾紛, 驚猿掛木雁呼群。逍遙曠野思遺世, 縹緲仙山獨見君。奇字每詢劉貢父, 兵謀還憶杜司勳。靈芝鬯草今猶昔, 重理瀛洲百代文。¹⁾

這是文廷式(1856-1904)1900年居留日本期間次韻內藤湖南詩的酬贈之作。內藤湖南(1866-1934)1899年第一次赴中國考察後, 在收錄其旅遊期間所撰並於次年出版的遊記《燕山楚水》緒言中也曾提及此詩²⁾, 並且說道:“與文氏之交始於遊清時, 且系我最傾心之處”, 可見對此詩極為喜歡, 評價很高, 所以將此詩“影印以代題辭”。文廷式在詩中將內藤湖南比作《資治通鑑》的副主編、北宋史學家劉放及晚唐著名詩人杜牧, 也表明了他對內藤才學的欣賞與推崇。

內藤湖南與文廷式結識於1899年10月, 而後1900年2月, 文廷式因戊戌變法失敗擔心受到牽連, 避禍於日本。根據文廷式的《東遊日記》記載, 兩人在日本又曾多次會面。³⁾ 文廷式回國後更將蒙文《元秘史》12卷謄抄一份寄贈給內藤湖南, 並希望內藤斡旋能為之抄錄《郎曄注東坡經進文稿》64卷的副本。⁴⁾ 由此可見兩人之間在詩才方面惺惺相惜, 學術方面亦互通有無。⁵⁾ 而那珂通世

1) 劉放(1023~1089), 北宋史學家。劉敞之弟。字貢夫, 一作貢父、贛父, 號公非。官至中書捨人, 一生潛心史學, 治學嚴謹。助司馬光纂修《資治通鑑》, 充任副主編, 負責漢史部分, 著有《東漢刊誤》等。杜牧(803年—約852年), 晚唐時期詩人、散文家, 曾於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入朝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 故稱杜司勳。

2)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 吳衛峰譯, 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 第1頁。

3) 文廷式的《東遊日記》中所記的兩人會面有八次, 文廷式2月17日到達東京, 19日見面, 日記中有“內藤虎之助來談甚久”字樣, 3月17日, 記有“偕內藤往那珂通世家, 白鳥庫吉、桑原陟藏在座, 觀《景教碑》影本。”內容。見文廷式:《東遊日記》,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 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 第1153-1175頁。對於3月17日的會面, 內藤湖南在刊發於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三日的大阪《朝日新聞》上的《蒙文元朝秘史》一文中也有記載:“文廷式芸閣氏, 前年來游(日本), 余因前已在滬上與之相識, 交往最款洽, 日夕相隨, 以筆代舌, 商榷古今, 語及元史, 芸閣向余道及其所藏《蒙文元(朝)秘史》(中略)余因求其歸後, 鈔寄來, 且持此書往見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陟藏三氏——三氏為當今治東洋史最精深之學者。那珂氏懇求見《元秘史蒙文本》雲雲……。”見內藤湖南:《目睹書譚》, 《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 東京:築摩書房, 1997年版, 149頁。

4) 見《致內藤湖南書》,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 北京:中華書局, 1993年, 第1252頁。

5) 見內藤湖南:《目睹書譚·蒙文元朝秘史》, 《內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 東京:築摩書房, 1997年版。載有文廷式的題記:“日本內藤炳卿熟精我邦經史, 卻特一代尤所留意, 余故特鈔此冊奉寄。願與那珂通世君詳稽發明, 轉以益我, 不勝幸甚!”

藉內藤處得來的《元秘史》副本進行譯注，著成《成吉思汗實錄》一書，成為“明治時代日本東洋學的金字塔”⁶⁾，從而成就了近代中日學術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1904年文廷式去世後，內藤湖南寫下《哭文芸閣》一文，發表在《大阪朝日新聞》上，對文廷式才學的稱讚、人生際遇的同情、壯年離世的痛惜溢於言表。

將目光投向兩人建立往來關係的清末時期，中國經歷了1840年鴉片戰爭、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和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國內政治改良運動戊戌變法也告失敗，可謂處於風雨動盪的內憂外患之中。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維新三十年取得成功，改革成績斐然，國力日益強盛，逐漸廢除了與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⁷⁾，加之甲午戰爭（日稱“日清戰爭”）的勝利更令其人心鼓舞、自信大增。那麼，在內藤湖南眼裏，作為日益腐敗凋敝的清國的士人文廷式究竟是什麼樣的形象呢？為何兩人之間可以建立與時代背景及其氛圍顯得有些相異的互相欣賞與認可的友誼呢？兩人在對時局的探討中有哪些共識與分歧？本文主要以內藤湖南與文廷式之間的筆談紀錄與文廷式的《東遊日記》為線索，就以上幾個問題作一分析和探討。

1 上海初會之文廷式印象

(1) 1899年遊覽中國之前的內藤湖南的相關情況

內藤和文氏得以相識的契機是內藤湖南1899年9月的第一次赴中國考察。這次期盼已久的旅行能夠得以成行是由於同年3月，鄰家失火殃及內藤寓所，令他多年搜集的藏書⁸⁾、手稿，以及他在秋田師範學校高等師範科就學時的摯友畑山呂泣的遺稿付之一炬，內藤湖南為排遣心情，遂在《萬朝報》報社和朋友們的資助下赴中國旅行，從而實現了他期待已久的夙願。

其時，內藤自1887年辭去秋田郡綴子小學的工作赴東京之後曾歷任《明教新志》（1887年）、《萬報一覽》（1888年）、《大同新報》（1889年）⁹⁾、《三河新聞》（1890年）、《日本人》（1891年改名為《亞細亞》）（1890-93年）、《大阪朝日新聞》（1894-96年）、《台灣日報》（1897年）的編輯或記者，

6) 神田喜一郎：《內藤湖南與文廷式》，劉美崧譯注，《江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66頁。

7) 1891年，俄國開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威脅到英國在中國的利益，英國為防止日本同俄國結盟，並欲以日本牽制俄國，因此改變了對日本外交的強硬態度。1894年7月，英國同日本簽訂了《通商航海條約》，通過該條約廢除了英國在日本的領事裁判權，並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1897年末，美、德、奧等15個國家先後同日本簽訂了類似性質的條約。1911年，日本國際地位大大提高，與美國等各個相關國家簽訂新條約，通過這一次的修約，徹底實現了關稅和法權的獨立。至此，日本完全廢除了同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參見牛淑芹：《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條約述論》，《史學月刊》，1999年第5期，第92頁。

8) 據他的友人回憶，在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內藤的藏書既已達五六千冊。三田村泰助：《內藤湖南》，中公新書，1972年。

9) 《明教新志》是大內青巒主持的佛教雜誌，《萬報一覽》是《明教新志》的附屬報刊，《大同新報》是大內青巒主持的尊皇奉佛大同團機關雜誌。

在報紙上發表批評政府、議論時政的文章，以敏銳的眼光、鋒利的筆鋒得到《明教新志》主辦者、也是當時佛教界重要人物的大內青巒，及作為政教社主要成員之一的三宅雪嶺等人的賞識與青睞。1897年，內藤湖南所著《近世文學史輪》、《諸葛武侯》、《淚珠唾珠》出版，顯示了他的史學素養。1899年他正擔任《萬朝報》的記者，這年內藤家裡也有一件喜事，他的長子4月出世了。不過，在《燕山楚水》的描述裡，內藤將應酬客人道賀的忙碌形容為“災難”，這與他趁等待延期的輪船時到奈良參觀唐招提寺金堂、遊覽藥師寺和到神戶訪友的積極主動正好成一對比。¹⁰⁾ 可以說，這時的內藤湖南既具備史學知識與學術修養，又具備作為記者的對時政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同時，也比較注重實地的考察，並顯示出將現實置於歷史的脈絡中進行學術性思考的思維特點。

此次中國之行從九月九日抵達中國到十一月二十五日離開返回日本的兩個多月期間，內藤遊歷了天津、北京、上海、蘇州、杭州、武漢、南京等地，會晤了陳錦濤、蔣國亮、嚴復、文廷式、宋伯魯、張元濟、羅振玉等人。

與一般文人墨客的遊山玩水不同，內藤湖南每到一處，除發嘆古、思古之幽情外，還對古蹟的成立、變遷及典故加以考證。很多歷史遺跡的來歷，他都能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正如他對日本暑假旅行的學生們所提出的要求，“我希望遊歷這些地區（中國大陸）的人，能夠具備一定的學術上、美術上的眼光”¹¹⁾，內藤湖南自己也正是以“學術上”、“美術上”的眼光來審視、評價人物、景物。其好古之心尤為明顯，“同樣的山水，聽說其間有古蹟，便覺得平添了三分奇”¹²⁾，“如果沒有千年帝王的遺址，諾樂（奈良）之地的殘山剩水，還有什麼能令人賞心悅目？”¹³⁾“那須的茫茫原野，一半植為樹林，一半墾成田圃，……，一邊回首顧望硫煙直上青空的那須岳，一邊沿着彎彎曲曲的野經來到古碑前，摩挲這一千二百前豎立的古碑，豈不是一種雅興？”¹⁴⁾ 這種對古代遺跡高度評價的崇古、尚古之好使內藤將“歷史知識”與“美術鑑賞力”緊密聯繫在了一起，成為他評判事物的一個重要標準。那麼，他是如何看待、以及評價中國的人物的呢？

(2) 1899年文廷式的相關情況

在上海，內藤與文廷式進行了會面和筆談。文廷式，字道希（一作道熾），號雲閣（一作芸閣），又號薊德、羅霄山人，晚號純常子，江西萍鄉人，生於廣東潮州，晚清清流派領袖之一。其祖父、父親皆為清代舉人，祖父著有《宜亭詩草》、《系言》等，父親著有《嘯劍山房詩鈔》，是書

10)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8、19頁。

11)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頁。

12)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頁。

13)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6頁。

14)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頁。

香門第之家。文廷式於光緒十二（1886）年參加會試，落第。與王懿榮、張謇、曾之撰並有四大公車之稱。光緒十六（1890）年，得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二十（1894）年大考翰詹，光緒帝親拔為一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他在甲午戰爭前、中、後都有奏折進言，對日本的企圖有較深洞察，主戰反對議和；平時為人直率敢言，對於培養人才整修吏治，加強內治防患外敵，興工商水利抵制洋貨等均有條陳建言：對是非有辨，剛直不阿，甲午戰爭中上折彈劾李鴻章失職、失察、一味求和。其交遊甚廣，與陳樹鏞、梁鼎芬、陳三立、王韜、郭嵩燾、鄭觀應、黃遵憲、張謇、張之洞、潘增、鄭孝胥、陳寶箴等都有所往來。

內藤與文廷式兩人還有一相似之處，都可謂少年便能作漢詩聞名。內藤湖南十三歲作漢詩，文廷式十歲即有詩作“涼風起燕趙，秋水隔江淮”。那麼，1899年的這次會面，內藤湖南眼中的文廷式是怎樣的一種形象呢？內藤湖南是否知道此時的文廷式正處於人生的危境之中呢？

1896年，文廷式被御史楊崇伊再次彈劾“遇事生風，常與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以致被“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¹⁵⁾ 楊崇伊，光緒二十一（1895）年授御史，就任後第一疏即於同年十一月首劾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所創設的強學會。而文廷式亦和強學會有關聯，成了此番遭楊崇伊彈劾的口實。光緒二十四（1898）年八月，官兵抓捕康有為不獲，但搜到一封文廷式寫給康有為的長信，信中辭句多“失檢”、“不敬”，此時光緒已被囚禁於瀛台，文廷式也被下令“密飭訪拿”，“押解來京”。¹⁶⁾ 其時文廷式由長沙轉移到湘潭，又到上海。到上海的目的本來在於東渡扶桑，未果，停留於此期間恰逢內藤湖南到訪上海而有了兩人的這次會面。

(3) 第一次會面的文廷式印象

“文氏是江西萍鄉縣人，庚寅科的榜眼，年四十四歲”，“據說他精通佛經，有誌於世界各宗教的研究，造詣很深”。¹⁷⁾ 這是內藤湖南對文廷式的初步認識，“精通佛經”可能是內藤湖南從別人處間接得來的一些有關文廷式的信息。

“身材魁梧，容貌很像《虎溪三笑圖》上的慧遠”，¹⁸⁾ “舉止落落大方，不拘小節，不與人苟合，往往有迂逆之處”。¹⁹⁾ 這是內藤湖南對文廷式的第一眼印象。這裏提及的《虎溪三笑圖》中的慧遠涉及一個歷史典故：相傳東晉僧人慧遠曾住在廬山西北山麓的東林寺中，潛心研究佛法，為表示

15)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三八六第2頁，轉引自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序言第2頁。

16)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504頁。

17)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9頁。

18) 慧遠大師（334—416），俗姓賈，中國東晉時人，雁門郡樓煩縣人（今山西寧武附近），出生於世代書香之家。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同修淨土，為淨土宗之始祖。

19)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9頁。

決心，就以寺前的虎溪為界，立一誓約：“影不出戶，跡不入俗，送客不過虎溪橋。”一日，陶潛（陶淵明）、道士陸修靜來訪，與語甚契，相送時不覺過溪，虎輒號鳴，三人大笑而別。

內藤湖南知此典故，顯示了他的史學知識功底深厚，而為何文廷式令他想起了慧遠，並覺得二人有相似之處呢？也許文廷式與慧遠在外貌和氣質上有相似之處，又因內藤已經聽聞文廷式對佛學有很深造詣，而慧遠也是東晉的得道高僧，從而將二者聯繫在了一起吧，由此可以略微觀察到內藤湖南對文廷式的第一面頗有好感。這和內藤對一般中國人的感覺、評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諸如，《燕山楚水》中的如下描述：

“平時和中國人擦肩而過的時候，連衣服袖子的接觸都使我心中不快，如今不得不硬擠到他們中間睡一個晚上，讓我感到很窩囊。”²⁰⁾

“同船有一個叫熊佐周的，是浙江衢州府人，看起來像個官吏。他和我筆談，我就和他應酬了幾句，聊以解悶，後來我把皮包裡的一份《萬朝報》送給了他。”²¹⁾

“不快”、“窩囊”、“聊以解悶”，內藤湖南對於中國人的認識、點評方面依然體現了作為其評價事物標準的所謂“學術上”、“美術上”的眼光。

內藤湖南在《中國人的好學》一文中一一列舉了宋伯魯、張菊生作為非專業人士而藏書豐富、芸閣閣重金購書、楊守敬與黎庶昌將在駐日期間搜集到的中國國內已經失傳的經籍影印成《古逸叢書》，並將其全部的版捐獻給蘇州書局、徐公使（徐承祖）等刊行日本書籍等事例，譽之為中國人好學。²²⁾但標題裡所指的好學的中國人顯然不包括上述引文中的一般的中國人，也不包括“（東本願寺學堂）……倏來倏去、志向不定，是追逐眼前利益的中國青年的常態……”²³⁾、“貪錢是名勝守衛的常例，但沒有像北京國子監孔廟守衛這麼過分的”²⁴⁾中所說的“中國青年”、名勝的“守衛”。內藤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批評“一般的日本人”，即那些對於“古人傾注畢生的精力而成的著作”連書名都不知道的日本人，因而將文廷式等人樹立為了好學的中國人的代表，這裏再次體現了內藤湖南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

至於“迂逆之處”，兩人在筆談開始，面對內藤客氣的寒暄“久仰大名。今天先生能枉駕光臨，令我喜出望外。……如果能通過先生得以拜訪各位（精通洋務的人士），將是我無上的榮幸”，

20)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1頁。

21)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2頁。

22)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69頁。

23)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93頁。

24)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8頁。

而文廷式的回復並未假以辭色，在討論清朝的政治、財政改革時也較少附和從而使內藤產生了這種印象吧。

內藤湖南提及了文廷式是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即知道文氏現在已被削職，但似乎並不知道文廷式與維新派的關聯及被密訪緝拿之事，不知是否是因為行文的隱諱而不曾涉筆。

相對於對文廷式這樣的人物的認識，內藤湖南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是灰暗、令其悲痛的。“正如我的料想，山都裸露着脊背，山腳下的土是褐色的，坡度很緩，海岸上可以看到不少陡峭的岩石。像撒上了沈香一樣的綠色覆蓋着的山野，正是南畫中常見的景色，兩千年郡縣制度的流弊使這個歷史久遠的國家荒廢到如此地步，實在讓人痛心。”²⁵⁾ 內藤湖南筆下的中國的整體形象暗淡與荒廢，是“讓人痛心”的，普通中國人是使其“心中不快”的，而相對於此，文廷式則在其眼中留下的是可以視之為好學者典範的學問者形象。內藤湖南對中國人的認識當中的矛盾，即對中國民眾的嫌惡和對中國文人的尊敬所顯示出來的明顯對立這一點，早有日本學者曾經指出過。²⁶⁾ 如前文所指出的，也許其根源仍然在於內藤湖南基於精英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審美標準和價值觀。

2 時政議論中的共識與分歧

(1) 內藤對中國時政的關注

內藤湖南的1899年中國之行，除考察中國的地理、歷史、文化、教育之外，尤為關注的是時政問題。前一年，即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主持的維新變法失敗，這給希望通過政治改革謀求國家自強，抵禦外侮的維新派人士以沉重打擊，也令同樣進行維新運動並實現“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理想、並關注中國時局變化的日本人十分不解。內藤湖南作為關心政治，對時事變化感覺敏銳的記者，也對中國的改革投以關注的目光，他來中國之前就於1898年9月11、13日在《萬朝報》上撰文《清朝改革的風氣》（上、下），將兩國的維新活動進行比較。指出今日清國的現狀與當初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情形有若干相似之處。諸如兩國改革風氣的興起都起於海防論、以“富國強兵”為第一義等。對於日本國內的所謂清國通嘲笑清國名士不懂西語，卻多誇耀一知半解的西學，認為他們的論說陳舊，既落伍於歐洲的新學說，又不足以探討救國之策，內藤予以批評並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豪傑之士中通西語、了解西方情況的也不多。²⁷⁾

此文發表之後，1898年10月27、29、30日又連載《支那改革說的二時期》、1899年2月發表《清國改革風氣未燼》，1899年8月發表《支那改革的難易》，一直密切關注、分析着中國時局的變

25)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1頁。

26) 佐藤慎一：「內藤湖南」，『アジアを夢みる』，『言論は日本を動かす』第3卷，東京：講談社，1986年，第42頁。

27) 內藤湖南：《清朝改革的風氣》（下），《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東京：築摩書房，1996年版，第520頁。

化。鑒於此，內藤湖南來到中國，很希望同中國的有識之士探討中國的政治改革問題。而作為內藤眼中的“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的文廷式也正是他希望能與之探討時政問題的對象之一。

(2) 文廷式對日本的立場與態度

內藤湖南至上海見到文廷式之前已先行到過天津、北京，在天津拜訪過“通曉實務”的人士嚴復、王修植，就時局中再進行變法的可能、財政改革問題、人才的教育培養等進行過討論。內藤湖南形容嚴復“眉宇間透着一股英氣”，認為“在這個政變以後人們噤若寒蟬的時期”，嚴復能夠“言談往往縱橫無礙，不怕忌諱”，是天津“第一流的人物”。²⁸⁾這與內藤湖南在北京的遭遇恰好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內藤湖南在北京所遇到的情況是“士大夫們都鉗口結舌，噤若寒蟬”，他從在中的日本人那裡獲知“政變以前，翰林院的人們都願意和國人交往：現在他們完全不再來往，避免和國人會面”。²⁹⁾最終，“在北京沒有可以交談的人”，主要遊覽了京城的名勝古蹟。

所以到了上海見到文廷式時，內藤開門見山，有些迫切地提出：“我這次來遊，先到了京津，只在天津見到嚴、王二氏。聽說上海多才士，都精通洋務。如果能通過先生得以拜訪各位，將是我無上的榮幸。”³⁰⁾

就兩個人的筆談紀錄來看，內藤湖南意在探詢中國“維新的時機”、“從哪裡著手”、“依照什麼樣的步驟進行維新”，對這幾個問題，文廷式多未明確回答或深入討論，也似乎並不十分同意內藤的見解。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及自身安危，不願過多討論政治。1898年底，文廷式參與維新派的活動而數次被楊崇伊彈劾，遭清廷拿捕，因此欲東渡日本以躲避危險，但因為未獲日本政府准許，未能成行。³¹⁾其二在於文廷式對於日本侵佔中國野心的察覺。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文廷式持主戰立場，多次就戰事進折陳言，其中可以窺見他對日本有着比較透徹的觀察和分析。

竊惟中國屏藩之國，莫重於朝鮮，厲害相關，形勢相倚，人人所共知也。此次倭人無故忽用重兵，名為“保商”，實圖朝鮮，亦人人所共知也。³²⁾

28)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0頁。

29)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38頁。

30)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5頁。

31)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505頁。

32)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轉引自文廷式：《朝鮮事機危迫條陳應辦事宜摺》（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頁。

文廷式在甲午戰爭初始既已察覺到日本以保護僑民的名義出兵的真實意圖。到了同年九月，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倭人之謀我已十餘年。軍械則造冊而知，炮台、海道皆測量而得。

在李鴻章之意，以為彼得朝鮮已滿其欲矣。豈知北洋之軍械、淮軍之無用，久為倭所深悉；六月以前，其奸細已遍布於中國。此其志不僅在朝鮮，洞然而無疑也。³³⁾

文廷式意識到日本侵佔朝鮮之外的更大企圖，於是結合當時各列強之間的利益爭奪的關係和形勢，兩害相權取其輕，向光緒提議聯合英、德以抗日、法。

此時倭人得志，勢將不利於英；法人與其兵謀，德國亦所深忌。故聞英人頗有藉端與倭開釁之志，兵船五十餘號已盡集南洋。德人亦特厚於我，凡將弁之效力於中國者，其主皆特賞實星；又任中國購買軍火，籍資馭敵。此非偏有所厚也，衛我即所以自衛也。臣等愚見，以為宜及此時，特派親信重臣與之商議，資其兵費，使伐倭人。聞英、德使臣皆已微示其意，湖廣督臣張之洞亦經密與商謀，大約不過二千萬金上下，便可遵辦。倭人既暗約法、俄，何能禁我之密連英、德？且與其議和而用為賠費，何如戰勝而出以犒師？得失甚明，可無疑義。雖他日或有恃功之意，如回紇之需索於唐，然兩禍相權，其輕於受侮於倭則已多矣。³⁴⁾

迫於戰事的危急、對國家命運的憂慮，文廷式聯合文海、何劭咨、李盛鐸、蔡元培、張謇等37名朝臣聯名上奏，陳書厲害，力主求助英、德以抵禦日本。從這裡已經能夠看到文廷式對日本的認知、態度和他所秉持的立場。其後，儘管文廷式等主戰派強烈反對議和，但由於清王朝實權掌握在慈禧太后手裡，她不願意六十大壽被戰爭干擾，而李鴻章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力，也企圖和解，以至於貽誤戰機，最終戰敗求和，簽訂了包括將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釣魚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等內容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3) 兩人時政對談中的共識與分歧

文廷式對於甲午戰爭失敗以致於議和割地的結局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倭人

33) 《芸閣先生全集》所載影印手稿，轉引自文廷式：《軍事危急非先除內奸難御外侮摺稿》（光緒二十年九月初），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3頁。

34)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轉引自文廷式：《聯銜密陳敵情巨測宜出奇計以弭兵釁摺》（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九日），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6頁。

勇敢之性，材武之力，皆不如我。其所以屢勝者，將士出於學校，練習有素故也”、“今者購械則專用洋器，戰陣則仍徂舊法；或且倉猝招募，即以出師”，因而主張“開學校以講武，本節制以練兵。俾橫經之士，並識軍謀；一介之夫，咸知陣法”。³⁵⁾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對日觀察和戰敗的反思，因而，在和內藤湖南的對談中，文廷式認為“近來有人議論和貴國聯合，打算借用貴國的兵力。這是不足為議的”。³⁶⁾他認為能從日本獲得幫助的地方是“希望貴國的人材為我們辦理各種事情，綱舉目張，使所有的事情都有先例”。³⁷⁾這一見解比較為內藤湖南所贊成和推崇，認為文廷式的想法“非常高明”。³⁸⁾

對於內藤湖南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談及對中國的維新的可借鑒性問題，文廷式更強調了兩國情形和狀況的不同，他說：“貴國一姓相承兩年多年，所以可以先定國是，然後漸漸修改。我國現在的情況不能仿照貴國的事例。制定治國的方法，在今天，博採各國的長處，救治千年的弊端，規模建立起來，憲法自然會實施，所以也不是難事。難的是新舊接替的交接，和尊攘的方法。”³⁹⁾

而對於內藤的抵抗外國的欺侮侵略與革除舊弊孰難孰易的問題，文廷式認為“沒有兵力，國家便無法維持，哪裡能談到治理的方法呢？”⁴⁰⁾恐怕對於文廷式來說，對中國欺侮侵略的“外國”是包括了日本在內的，而內藤湖南可能是就英、法、德、俄等而言。文廷式對兵力的重視，顯然是將“外國的欺侮侵略”視為更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來對待，是優先於“革除舊弊”的，而內藤則認為清朝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問題是財政問題，⁴¹⁾“中國改革的第一步，應該整頓財政，把政府的歲入增加到現在的五倍以上”，⁴²⁾他更進一步考慮的是如何增強日本在中國的影響力。既有外交方面的權衡，如他建議日本駐清國領事官應當注意到督撫等地方大員所握有的權力、與他們周旋的重要性，要“機敏地利用這樣的交涉，到處擴大自國的影響”；⁴³⁾也有商貿方面的思考，如“和專管租界問題並行不悖、於現在中國經營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內河航路的擴張”。⁴⁴⁾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轉引自轉引自文廷式：《請開學校講習武事片》（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7、58頁。

36)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6頁。

37)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6頁。

38)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7頁。

39)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7頁。

40)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8頁。

41) 內藤湖南：《中國調查的一方面——政治學術的調查》，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9頁。

42) 內藤湖南：《中國改革的難易》，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87頁。

43) 內藤湖南：《在清國的領事官》（其一），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96頁。

44) 內藤湖南：《中國的內河航路》，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99頁。

也正是出於對日本在中國的經營的考慮，內藤湖南的這次中國行除了探幽訪古，考察地理風土、教育文化的狀況之外，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同中國的有識之士討論時政，考察中國維新變法、革除舊弊的思路、方法和途徑。而時政討論的背後則在於“瞭解清國朝廷內外的情況”，這是他感覺很有裨益的地方⁴⁵⁾。

內藤於明治三十三（1900）年三月的撰稿中說到：“如果想瞭解中國的現狀，不如通過和那些希望有所作為的士大夫、不得志的人的深交來獲得。”⁴⁶⁾文廷式正是內藤以如此標準界定的人物之一，內藤湖南在來中國之前即已通過逃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在日本政教社的雜誌《日本人》上所刊登的《論中國政變》一文獲知文廷式被慈禧罷免的消息。⁴⁷⁾換句話說，內藤湖南意欲與文廷式進行時政改革的探討，一方面期待能夠建立“深交”的關係，令“自己的交遊能產生實效”，對中國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也在於通過作為前翰林院侍讀學士、精通洋務的維新之士的文廷式瞭解清國朝廷內部、變法及改革的動向等情況。

內藤提出的問題：“時機的改變，首先需要一個翻天覆地的舉動。我國幕府的施政，很久以來不得人心，所以必須打倒它，然後國家的狀況為之一變。貴國當今的狀況，是否屬於同樣的例子呢？”⁴⁸⁾便意在試探繼戊戌政變失敗後接下來維新人士對改革會採取怎樣的途徑，但文廷式基於當時的政治因素及自身立場並未展開更具體的深入陳述。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兩人處於不同的立場，有各自對問題的思考，從自身的出發點看問題，難免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也令文廷式在內藤湖南眼中留下了前述的“不與人苟合，往往有忤逆之處”的印象。

3 東京再晤之文字酬唱與學問交流

1900年2月17日，文廷式到達東京。2月19日，日本《時事新聞》報登載了文廷式來日的消息：“文廷式來游，前翰林侍讀學士文廷士在清國名聲顯赫，兩三年前就有意來游我國。這次終於如願，據說已於前天抵京。又傳聞說，此行只為觀光，求與詩客文人的交遊。”

實際上光緒二十四（1898）年八月十五日，天津報界披露了清廷拿捕文廷式的密旨，這是文廷式渡日的真正原因。文廷式1月13日自長沙起程，中途因天氣狀況，航船延誤等原因，直到2月9日方登上開往日本的山城丸號。在長沙到上海的途中，利用候船的間隙，文廷式訪魯肅墓、登岳陽樓、觀炮壘，賦詩吟句、訪古探幽之文人的雅趣和內藤湖南十分相似。不過，和內藤遊歷

45)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3頁。

46) 內藤湖南：《今後到中國考察的人士》，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7頁。

47) 內藤湖南：《讀梁啟超〈政變論〉》，《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東京：築摩書房，1996年版，538頁。

48)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7、88頁。

中國大陸的心境所不同的是，文廷式時刻關注著國內形勢，憂慮國家的前途命運。1月13日通過報紙得知“山東亂事已蔓及直隸”、“法人要素各款”、“意大利雖不遽起，亦未救平”，以致“百憂攢心”、“夜不成寐”。⁴⁹⁾

文廷式乘船經長崎、神戶，其中2月13日途經馬關時，因“目疾畏風”，並且對李鴻章在此與日本媾和，簽署割地賠銀條約一事耿耿於懷，“不願經此辱地損人神智”，“遂不登岸”。⁵⁰⁾文廷式的此種心情除了以之為國恥之外，和與李鴻章之間相互彈劾，各為帝黨、後黨，所持政治立場不同也有關係。

文廷式到達東京後的第三天，即2月19日內藤湖南前來拜訪，想必是看見報上的消息就立刻前來了。故友重逢，定是格外欣喜。文廷式當日日記中有記載：“……內藤虎之助⁵¹⁾來談甚久。”⁵²⁾但具體談論何事，日記中並沒有記述。前一年兩人在上海會面時，文廷式曾說：“觀察國情的人正應當像《管子·八觀》上所說那樣。改日我會和您一一詳細分析，並且再次向您請教。”⁵³⁾這次不知是否談及該論。

《管子·八觀》論述的是如何從立法、農業、經濟、財政、教育、廉政、執法、物資儲備八個方面來評論一國之治的狀況。⁵⁴⁾文廷式原為翰林院侍讀學士，職務內容為職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以考議制度，詳正文字，備皇帝顧問。凡大政事、大典禮、集諸臣會議，則與諸司參決可否。這既是他份內的工作，又因受光緒帝恩寵信任，加之本身既有的愛國憂民的深厚情懷，值此國家存亡之時，對如何整修國家內政多有深入思考，從他的奏折中也能窺知這一點。⁵⁵⁾他對內藤提及此文，應該是對此文內容比較認同和推崇，欲對此論加以研究，從中尋找可供借鑒的治國良策。這次“內藤虎之助來談甚久”，不知是否就治國方略兩人有所深入交流。但見該日日記中“內藤虎之助來談甚久”後面記曰：

“各國制度無純美亦無盡非；立法而行，又隨時斟酌損益之，斯為美耳。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我所不取。若參以宗教家之言，預揣不可知之事，以為治道在是，則尤矮人觀場，只

49)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56頁。

50)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61頁。

51) 內藤湖南名為內藤虎次郎，此處系文廷式的誤記。

52)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62頁。

53) 內藤湖南：《燕山楚水》，吳衛峰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8頁。

54) 《管子·八觀》內容參見古詩文網：http://so.gushiwen.org/guwen/bookv_3590.aspx 2016.7.18

55) 文廷式：《敬陳管見摺稿》（光緒二十年六月初），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頁。

見其不知量也”。⁵⁶⁾

此段陳述顯示文廷式認為各個國家的制度均有利弊，立法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斟酌而行，以為治理國家就是如“宗教家”一般，預先揣測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情況，這種看法是一種短見，表明了他的不同見解。

實際上，除了上節分析的文廷式的民族、政治立場與內藤湖南不同之外，文廷式本身就比較獨具個性，對此他自己也十分清楚。他於1902年所撰《雲起軒詞鈔自序》有雲：“余於斯道，無能為役；而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來，涉獵百家，推較利病，論其得失，亦非捫籥而談矣。而寫其胸臆，則率爾而作，徒供世人之指摘而已。”⁵⁷⁾ 指出自己“志之所在，不尚苟同”，其實這一點和內藤湖南也有幾分相似，內藤湖南正是“不苟同”，才發現了天才學者“富永仲基”、“章學誠”，此是後話。

其後，內藤和文廷式又分別於3月1日、3日、10日、16日、17日、21日、4月4日有七次會面。其間內藤陪同文廷式拜會了大內青巒、那珂通世等人，並贈送《日本美術史》、南條文雄《梵本阿彌陀經講義》等書。據文廷式日記記載，文廷式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陟藏曾討論景教是否為基督教中的“聶斯托爾派”一事，文氏認為此乃附會、據理而辨，結果在場者“皆無以應”。⁵⁸⁾

內藤湖南在明治三十三（1900）年六月寫的《喜愛讀書之風》一文提到日本的紳士不喜讀書；相反，中國有識之士如文廷式則熱心讀書，並加以稱贊：“近頃來訪我邦一名士（文廷式），以其博聞強記，使此間學者為之傾倒。他日間徵逐詩酒，應酬若給，往往至夜晚。而深夜剔燈，必披讀書札，迄曉而罷。”⁵⁹⁾ 看來在這幾次交遊中內藤對文廷式的博學多識有了更深的認識。

文廷式居留日本期間，參觀上下議院、陸軍團隊所、博物院、裁判所、華族學校等，考察日本的政治、法制、教育；也遊覽了上野動物園、欣賞了上野的櫻花，並有數語點評；到帝國圖書館、書肆訪書購書，日記中對以上內容都有簡略記載。如文廷式到日本時新聞報道所言，他“與日本學界文壇，相互探討學術，彼此酬唱文字，情誼甚洽”，而對於“日本政界鉅子要人，如近衛公爵、長岡子爵、外交部次官高平、內務大臣西鄉從道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犬養毅、板垣退助等，紛紛邀敘約談，則冷淡應之，堅持戒言時事。”⁶⁰⁾ 想必很希望“瞭解清國朝廷的內外情況”的

56)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63頁。

57) 文廷式：《雲起軒詞鈔》序，何東萍，《〈雲起軒詞〉箋注》，岳麓書社，2011年。

58)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71頁。

59) 內藤湖南：《喜愛讀書之風》，《內藤湖南全集》第二卷，東京：築摩書房，1996年版，第276頁。

60)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507頁。

內藤對這一點多少是有些失望的。

對於戒言時事的原因，文廷式在《東游日記》中有所解釋，一方面是日本當時的政治情況較為複雜，進步黨與藩閥政府相對抗；一方面自己“不在位不謀政”。⁶¹不過這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文廷式不能不謹慎、低調，同時基於前述的文廷式對日本的企圖的擔憂，使其對日本要人談論本國內政情形有所顧忌，不願透露太多，顯示出老成持重的作派。這和梁啟超到日本後1898年12月在雜誌《日本人》上撰文《論中國政變》，論述戊戌變法失敗原因，寄希望於日本的幫助是有所不同的。

數次交遊中，雖然文廷式避談時事，但學問的切磋使內藤湖南加深了對文廷式學識的瞭解。兩人交流範圍很廣，據文廷式《東游日記》所記載的內容，涉及宗教、歷史，而《內藤湖南全集》中提及的，還包括對清朝的詩的探討。

現在我們已重新認識文廷式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錢仲聯先生稱其《純常子枝語》一書“闡說經傳，論證九流，校訂文字，品評詩詞，記述朝章國故、士林交往、域外見聞，旁涉釋藏道笈耶回之書、天步歷算之學，下及疑龍撼龍之流，可謂沈沈夥頤。方之往古，蓋伯厚、亭林、辛楣諸家之亞；求之並世，較沈乙庵《海日樓札叢》雖精湛或遜，而廣博差同”。而在1900年的時候，內藤湖南就已經發現了文廷式的才華，可謂有很好的識人的眼力。在文廷式死後，他在1904年10月7日《大阪朝日新聞》所發表的《哭文芸閣》一文中給予文廷式很高的評價：“奇偉磊落之材，不為世用，毀譽紛紛，遂死於窮厄之中”，“古來才人奇士多不得志，像困厄與槽櫪的千里馬，文廷式正是這樣的不幸的曠世奇才。”⁶²是謂名實相符。

4 內藤湖南筆下的文廷式印象及其評價

如果用一組關鍵詞來呈現內藤湖南眼中的文廷式的形象的話，可以有這樣一些詞語：南方人士中的佼佼者、落落大方、不拘小節、不與人苟同、好學的中國人、精通洋務、博聞強識、奇偉磊落之材、曠世奇才。

內藤湖南1899年除了拜會文廷式，也與嚴復、王修植、陳錦濤、蔣國亮、張菊生（張元濟）、羅叔韞（羅振玉）等人交談過，皆留有筆錄。相對於與嚴復、王修植等人就時政、教育、翻譯、學術等暢所欲言，那麼文廷式就顯得似乎不那麼開誠布公，給內藤湖南留下了“往往有忤逆之處”的印象。這一方面如前所述是文廷式的個性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個人政治立場、時局形勢所致的因素存在。內藤湖南在後來的著作當中時有提及文廷式，對其學識大加贊賞，將之視為“好學的

61) 文廷式：《東游日記》，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175頁。

62) 《哭文芸閣》，轉引自《書論》第13號《內藤湖南全集補遺》，1978年。

中國人”，並將其樹立為喜愛讀書的中國人的形象，用以批評本國不愛讀書、尤其是不讀古書的人。這是基於內藤自身的審美標準，即以“歷史的”、“學術的”眼光來審評人物、風景，一般的普羅大眾難以得到內藤如此的關注與眷顧。這顯示出內藤湖南的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

文廷式還具有一種身份，即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經常出入光緒帝身邊，時有奏折陳事建言，為光緒所倚賴和信任，屬於參與朝廷事務、瞭解朝廷內務的人物。內藤湖南赴中國旅行之前已經得知文廷式被慈禧罷免一事，文廷式遂成為內藤眼中的“希望有所作為的士大夫”、“不得志的人”，也就是內藤覺得應該“深交”，以瞭解中國的現狀的人物。正因為內藤對中國的時局的關注，所以他在這次旅行期間，與會晤的中國人士（羅振玉除外）無不談論有關改革、變法、教育等與時事關係密切的內容。

文廷式還有一位相交較深的日本友人野口寧齋。野口寧齋（1867-1905），長崎詩人，日本明治漢詩界泰斗森槐南的弟子，在1897年以後的東京漢詩界里處於中流砥柱的地位。在1900年文氏居留日本期間與之相識，回國後兩人也有書信往來，並互贈書籍。野口寧齋在文廷式回國後，於1900年在《太陽》的“家庭談叢”上撰寫兩萬字長文《文廷式》介紹其家譜淵源、學術修養、人品風格，可見他對文廷式的關注更加全面。在此文中野口寧齋將文廷式描繪得接近完美，一方面緣於他與文廷式的交情之深，另一方面可推測為野口寧齋試圖借助文廷式來振興日益衰微的漢詩界。⁶³很顯然，內藤湖南與野口寧齋對文廷式的關注點與出發點有所不同，但兩人對於文廷式的才識的認可是一致的，尤其是內藤湖南，以其獨具的慧眼識得文廷式在宗教、文學方面的高深造詣。

雖然1899年前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因國力的消長而呈現出某種緊張，並且兩人之間各自的立場和思路也不相同，但內藤湖南與文廷式唱和文字、切磋學問、交流學術，仍不失為超越時代語境的、中日文化與學術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談。

內藤湖南與文廷式在個人經歷和學術風格上有一些相似點，如少年成才、博聞強識、學貫中西、通古識今、能文能詩、不輕易苟同等。兩人也都是愛國、為國家進言獻策，對政治抱有關心的人。但因為立場不一樣，雙方的觀點中既有共識，也有分歧。

內藤和文氏就日本在一些事業上幫助中國，為中國做一個示範方面意見一致，但文廷式雖然“希望貴國（日本）的人材為我們辦理各種事情”，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於自強，而內藤則希望加強日本在中國的作用和影響。對於改革的重點，內藤湖南強調改革財政，而文廷式認為應當“講武”、

63) 鄒雙雙：《文廷式與日本文人的交遊——以與野口寧齋的交往為中心》，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8月，第28卷第4期。

“練兵”。內藤湖南的措施雖然更涉及根本，但中國處於面臨主權不斷淪陷的境地，“兵力”在文廷式看來更為急需。這些分歧呈現了不同國家境遇、民族身份下的不同的思路和情感。

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考察內藤湖南與文廷式的交遊情況，展現了內藤湖南筆下的文廷式印象、兩人在時政議論中的共識與分歧和內藤湖南對文廷式的评价。並分析了這一印象、共識與分歧、評價形成的時代背景及其他各相關因素。

內藤湖南的中國學人交友圈十分廣泛，深交者也並不限於文廷式一人。對此，錢婉約在《仰承與垂範的變奏——內藤湖南與中國學人關係譜系》（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9月）一文中詳細的梳理。作為今後的課題，擬對內藤湖南與其他中國文人的交往作進一步分析和探討，以呈現內藤湖南對中國人物認識與評價的傾向和特點。